

隋唐墓出土的“古镜”^{*}

——兼论隋唐铜镜图文的复古问题

范淑英

内容提要 考古发现在隋唐墓葬中有随葬隋唐以前铜镜的现象,结合唐代文献可知,这些早于唐代铸造的铜镜应是唐人所言的“古镜”。“古镜”不仅神异、珍贵,在社会活动中也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影响了隋唐时期铜镜的花纹设计。从隋唐墓出土的“古镜”几乎都为汉镜的事实可知,魏晋南北朝留下来可资唐人借鉴的铜镜资源较少,所以隋唐时期复古风格的铜镜绝大多数是针对汉镜的仿制和创新,并且这一过程从隋至初唐起至晚唐从未中断。但是,唐人对“古镜”的年代、铭文及花纹认识皆不明确,这也造成了唐代工匠及道教术士假托古镜创造新镜的可能性。

关键词 隋唐墓 汉镜 唐镜 复古风格

一 隋唐墓出土的“古镜”

本文所论的“古镜”是指隋唐墓中出土的隋唐以前的铜镜。这些铜镜尽管是隋唐以前的工匠所铸造,但因出自隋唐墓中,表明它们已流传至隋唐时期。在唐代诗文、小说中常见“古镜”一词,这里加以借用。

在以往考古发掘工作中,偶见隋唐墓中随葬有隋唐以前古镜的现象,见于报告的有以下诸例,为了叙述方便分为两京地区之西安、洛阳、河套以东、黄河中下游以北之北方地区和长江以南之南方地区四个区域进行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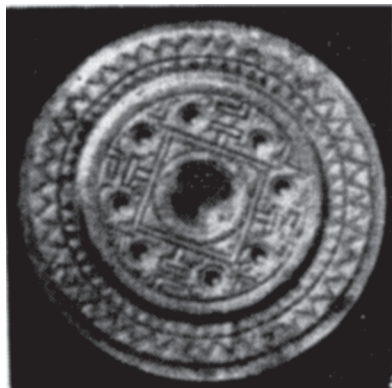
(一)西安地区

1955年西安东郊高楼村14号中唐墓发现一面直径10厘米的汉式规矩镜[图一]^{〔1〕}。规矩镜,现定名为博局镜,主要有四神博局纹镜、鸟兽博局纹镜、几何(云纹)博局纹镜、简化博局纹镜等。高楼村14号唐墓

^{*} 本研究为“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唐代千秋镜研究》课题”(项目编号09JK168)成果之一。

〔1〕 杭德州等:《西安高楼村唐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页103、页105,图一。

〔图一〕云纹博局镜 西安东郊高楼村14号唐墓出土



〔图二〕龙虎镜 西安东郊十里铺68号唐墓出土



〔图三〕昭明镜 西安西郊热电厂隋唐墓M88出土



出土的这件博局镜为云纹博局纹镜，此镜圆钮，圆钮座，座外双线方格，主纹区位于方格与弦纹之间，饰有T、L、V，其间填饰8个乳钉和卷云，边缘饰有双线波折纹和锯齿纹各一周。据《长安汉镜》一书对博局镜的研究可知此镜主要流行于新莽至东汉早期^{〔1〕}。

1956年西安东郊十里铺68号唐墓出土一面直径14.3厘米的灵鼈镜〔图二〕^{〔2〕}。此镜应为龙虎镜，圆钮，圆钮座，波折纹缘。主纹区饰龙虎瑞兽，龙身饰乳钉纹。其外有铭文带和一道栉齿纹，铭文为：“陈氏作镜四夷服，多国家口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鬯，长保二亲得天力。”此种铜镜流行于东汉至三国时期。

1973年发掘的太宗贞观四年(630)李寿墓墓室中出土过一面重列神兽镜，发掘者称此种铜镜过去在西安东郊坝桥457号汉墓和乾县六区汉墓中发现过，当是东汉镜^{〔3〕}。

1990年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M88出土过一面直径8.9厘米的铭文镜〔图三〕。桥形钮，圆钮座，座外饰内向连弧纹，外区为铭文带，铭文：“内而清而以昭而明光而象夫日月心忽而不泄。”此镜当为西汉或新莽时的昭明镜，同墓共出一枚货布(王莽钱)^{〔4〕}。

（二）洛阳地区

1955年洛阳老城区北邙山30号唐墓出土了一面直径为18.3厘米的神人车马龙虎画像镜〔图四〕^{〔5〕}。大

〔1〕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页130—140，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省出土铜镜》图96，页106，文物出版社，1959年。该书图99为1955年西安东郊纬十八街长乐坡迤西出土的“青羊”铭灵鼈镜，直径10.6厘米；图98为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东南出土的灵鼈镜，该镜直径14厘米，有铭文带：“龙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口家人民息，胡羌口口天下复，风雨时节五，官位尊显口禄食，长口口亲乐无已。”这二镜也应是东汉至三国的龙虎镜，排在唐代铜镜部分，很可能二镜也出自唐墓，为唐墓出土的古镜。

〔3〕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页77；西安东郊坝桥457号汉墓和乾县六区汉墓出土的重列神兽镜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省出土铜镜》图76、77，页8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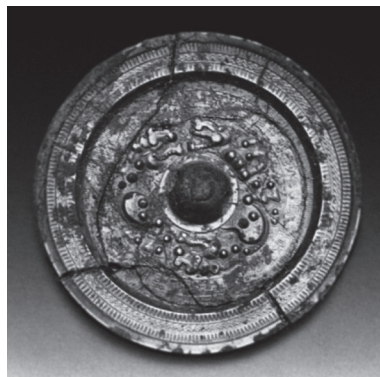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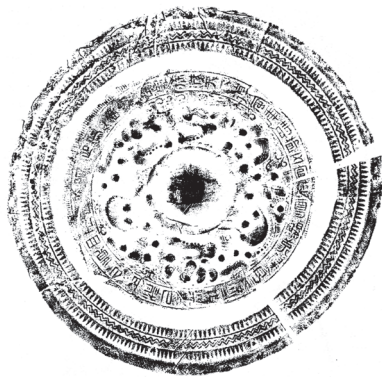
〔4〕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4期，页50—95。

〔5〕 赵国壁：《洛阳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页94。

〔图四〕神人车马龙虎画像镜
洛阳老城区北邙山30号唐墓出土



〔图五〕龙虎镜
巩义芝田唐墓88HGZM13出土



圆钮，弦纹连珠纹钮座。主区纹饰由四枚圆座乳钉分为四区，相对二区饰有东王公、西王母和二侍者的画像，画像分别有“王公”、“王母”的榜题。另外相对二区为虎豹和奔驰的车马，车有盖，舆内坐御者一人。主区画像空白处填充卷云。画像外有铭文带和一道栉齿纹，铭文为：“蔡氏作竟佳且好，明而月，世少有，刻治今守(当为禽兽)，悉皆左，令人富贵宜孙子，寿而金石不知老兮，乐无极。”边缘为锯齿纹和云藻纹各一周。此镜与《洛阳出土铜镜》著录的城北岳家村30号墓出土、直径19.2厘米的东汉王公王母画像镜铭文、纹饰完全相同^{〔1〕}，也应为东汉镜。

1988年发掘的巩义芝田属于唐高宗时期的88HGZM13墓室西部棺内随葬有一面直径14.4厘米的铭文镜〔图五〕^{〔2〕}。呈银白色，虽已破裂，但纹饰、铭文还比较完整清楚。该镜薄胎厚缘，圆钮，圆钮座，座外装饰二大一小三条龙。二条大龙口含珠，龙身均饰乳钉纹。其外为铭文带和一道栉齿纹，铭文：“罔氏罔竟四圉罔多贺君家人民恩胡关罔罔天下复风罔时节五官位尊显象禄食长保二亲乐世已。”边缘上饰锯齿纹、双线波折纹、锯齿纹各一周。此铜镜应属东汉至三国时期流行的龙虎镜类。

1993年三门峡水工厂晚唐墓M5出土一面直径17厘米的七乳四神瑞兽镜〔图六〕。半圆钮，钮外饰重圈和射线纹，里圈环列九乳，间以云纹。外圈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间以瑞兽和七乳。外饰射线纹，边饰平素纹，间以几何和花草纹带^{〔3〕}。此镜与1956年西安东郊高楼村第1号汉墓出土的兽带镜极为相似^{〔4〕}，也应为汉镜。

〔1〕 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图57，图片说明见页9，文物出版社，1988年。

〔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芝田晋唐墓葬》，页178文、页179，图一七〇、彩版一八图1，科学出版社，2003年。报告著录铭文从“官位尊显”始，实际上应从“龙氏作竟”始。

〔3〕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水工厂唐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3年第4期，页73。

〔4〕 前揭《陕西省出土铜镜》图59，页69。

(三)北方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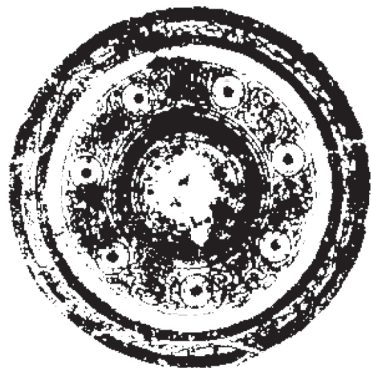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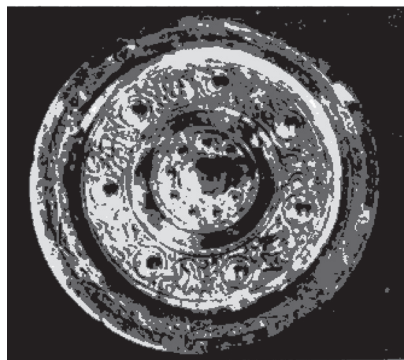
1976年山东嘉祥英山开皇四年(584)徐敏行夫妇墓发现一面铭文镜,发现时已破为三块,铭文为:“茅氏作五月[子][午]镜,辟不羊(祥),子孙千人乐未央;当大富,宜侯王,□□□□。”报告称该镜花纹、铭文类同晋镜^{〔1〕}。

1990年辽宁朝阳“凌河古墓群”区域内发现的武德二年(619)蔡泽墓(91CGJM 2)出土有二面古镜,一面为直径12.8厘米的“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图七],圆钮、四蝠形叶钮座,蝠形叶间填“长宜子孙”四字铭文,其外为八个内向连弧纹组成的圈带,八连弧间有“□□三公”铭文和菱形纹,素宽缘^{〔2〕}。“长宜子孙”连弧纹镜流行于东汉时期,此镜四叶呈蝙蝠形,同于洛阳烧沟东汉晚期M147出土的连弧纹镜^{〔3〕},应属东汉晚期;另一面为直径16.6厘米的神人龙虎画像镜[图八],圆钮,弦纹连珠纹钮座。内区双线方框,四角饰云纹。框外四角有四乳,将中区四等分,对置主纹神人和龙虎画像。神人端坐,左右各有一侍者,应是描绘神话传说中的东王公和西王母的形象。张牙舞爪的青龙与昂首腾奔的白虎相对置,青龙和白虎前各踞一人,作供奉状。外有铭文带和一道栉齿纹,铭文共32字。边缘上饰锯齿纹及神兽、禽鸟等各一周^{〔4〕}。此类镜流行的年代应在东汉至三国时期。

(四)南方地区

1964年湖南长沙近郊CM270号隋墓出土一面直径7厘米的厚边铭文镜[图九]^{〔5〕},圆钮,十二连珠钮座,主区弦纹带内有铭文

〔图六〕七乳四神瑞兽镜
三门峡水工厂唐墓M5出土



〔图七〕“长宜子孙”连弧纹镜 武德二年蔡泽墓出土



〔图八〕神人龙虎画像镜 武德二年蔡泽墓出土

〔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文物》1981年第4期,页31文、页33图一七。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北朝及唐代墓葬》,《文物》1998年第3期,页18文、页25图四四:2。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页172,科学出版社,1959年。

〔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北朝及唐代墓葬》,《文物》1998年第3期,页18文、页25,图四四:1。

〔5〕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近郊隋唐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4期,页205文、页206图五:1。


〔图九〕日光镜
湖南长沙CM270号隋墓出土



〔图十〕四神博局纹镜
江苏仪征胥浦唐墓M9出土



〔图十一〕瑞兽博局镜
广州黄花岗古墓群M13号唐墓出土

一周，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铭文间隔以“”或“e”形符号，此镜当属西汉至新莽流行的日光镜。

1984年江苏武进县湖塘乡WGM1号隋墓出土了一面直径为11厘米的鸟兽博局纹镜^{〔1〕}。半球形钮，柿蒂纹钮座，方框四角各有一个乳钉纹。飞禽走兽为线条勾勒，处于补白的地位，再外有一圈栉齿纹，边缘饰锯齿纹。报告中虽未附图，但从文字介绍来看，该镜不是隋代流行的镜纹，应属于西汉至东汉时期的博局镜。

1982年江苏仪征胥浦唐墓M9出土一面直径12.8厘米的四神博局纹镜〔图十〕^{〔2〕}。半球形钮，方钮座，内区饰T、V、L纹、四乳钉、四神，其外饰一圈栉齿纹、边缘饰二周锯齿纹。M9的年代在安史之乱后，而出土的这面铜镜应属于东汉镜。

1997至1999年广州黄花岗古墓群发掘中M13号唐墓出土了一面直径13.3厘米的瑞兽博局纹镜〔图十一〕。此镜半圆钮，圆座，平缘。钮区饰9枚乳钉纹，间以三角纹和“H”纹。主区饰T、V、L纹和四个小柿叶乳钉纹，分成四组饰瑞兽纹，其外饰一圈栉齿纹，边缘饰锯齿纹、勾连云纹各一周。发掘者认为：“M13所出的规矩纹铜镜从铜质、形式看均为汉镜，应属唐人传世汉镜随葬。”^{〔3〕}

以上列举的铜镜虽出自隋唐墓，但非隋唐时期铸造。除徐敏行夫妇墓发现一面晋镜外，余皆为汉镜。那么当时的人们知道这些是早于隋唐的古镜吗？如果知道，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收藏并随葬这些古镜呢？

二 唐人的“古镜”观念

唐代的诗文小说中常有发现古镜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所使用的“古镜”一词，明显地与“铜镜”、“镜”相区别，明确地反映出唐人所言的古镜应指早于唐的铜镜，并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具体来讲，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常州市博物馆、武进县博物馆：《江苏武进县湖塘乡发现隋唐墓》，《考古》1990年第6期，页572。

〔2〕 吴炜：《江苏仪征胥浦发现唐墓》，《考古》1991年第2期，页190。

〔3〕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黄花岗汉唐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页481、482文；页482，图二九。

（一）“古镜”的神异性

唐人认为凡古镜皆具有神秘的色彩和神异的作用，这是有关古镜的文献资料最鲜明的特征。

首先，古镜能显现奇异影像。

唐代笔记小说中有许多古镜呈现神异物象的记载，神异征象之一便是古镜照心照胆，如唐李肇《松窗杂录》：“卫公长庆中在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举异于当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忽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惊取照之，历历尽见五藏六府，营脉动，竦骇神魄，因腕战而坠。”^①五代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咸通中，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偶获一古镜，可径七八寸，方拂拭，则清明莹澈，皎洁鉴人，心腑洞然。”^②

唐人古镜照心照胆的说法沿袭了汉以来铜镜神异性的认识。《西京杂记》在讲到秦咸阳宫神异宝物时说：“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历历无碍。人有疾病在内者，则掩心而照之，必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帝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则杀之也。”^③秦咸阳宫宝镜照胆的说法在唐代深入人心，除了唐代诗文和铜镜铭文中有所反映外（见第四部分），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物异》：“秦镜，儋溪古岸石窟有方镜，径丈余，照人五脏。秦皇世号为照骨宝，在无劳县境山。”^④可说是《西京杂记》咸阳宫宝物的另一版本。

其次，古镜具有神异功能。

与古镜显现的神异物象相关联的是这些影像能预示吉凶。唐李冗《独异志》卷中：“唐中宗为天后废于房陵……有人渡水拾薪，得一古镜，进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语曰：‘即作天子，即作天子。’未浹旬，践居帝位。”^⑤古镜成为中宗重获天子位的吉兆。唐李肇《尚书故实》：“裴岳者，久应举，与长兴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镜子，乃神物也。于相布素时得一照，分明见有朱衣吏导从。他皆类此。宾护与岳微亲，面诘之，云：‘不虚。’旋亦坠失。”^⑥文中所述朱衣导从乃是富贵的象征，对于尚为布衣的于左揆来说镜中出现富贵的征象无疑是一大吉兆。

在唐以前就有铜镜能预示吉凶的说法，唐代古镜的征兆作用应渊源于此。《三国志》卷四十二《蜀书》十二《张裕传》云，蜀郡张裕“又晓相术，每举镜视面，自知刑死，未尝不扑之于地也。”^⑦《晋书》卷二十七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页12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另见《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器玩四》“浙右渔人”条，第五册，页1777，中华书局，1986年。

② 前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页1770。

③ 前揭《太平广记》卷四〇三《宝四》“秦宝”条，第九册，页3247。

④ 前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页626。

⑤ 前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页936。

⑥ 前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页1166。另见《玉泉子》，前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页1439。

⑦ 《三国志》第四册，页1021，中华书局，1964年。

《五行志上》：“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将袭王敦，既而中止。及还，家多变怪，照镜不见其头。此金失其性而为妖也。寻为敦所袭，遂夷灭。……安帝义熙初，东阳太守殷仲文照镜不见其头，寻亦诛翦，占与甘卓同也。”¹镜中不现人面，这种奇异镜像当属怪异之事，唐代笔记小说《独异志》便将殷仲文的照镜故事归入志怪中²，作为镜示凶兆的代表。

另外，古镜具有宗教法器般神异的功能。《潇湘录》有二则古镜照物毕现原形的故事，一则是：“唐万岁元年，长安道中有群寇昼伏夜动，行客往往遭杀害。……后有一道士宿于逆旅，闻此事，乃谓众曰：‘此必不是人，当是怪耳。’深夜后，遂自于道旁持一古镜，潜伺之。俄有一队少年至……道士以镜照之，其少年弃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诵咒语。约五七里，其少年尽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复逆旅，召众以发掘。有大鼠百余走出，乃尽杀之，其患乃绝。”³另一则是：“至夜，（马举）令左右召之（叟）。见室内唯一碁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镜照之。碁局忽跃起，坠地而碎，似不能变化。”⁴在古镜的光照下，少年劫匪显现大鼠原形，神秘老叟显现棋局原形，小说的这一构思延续了魏晋以来人们对铜镜现形的认识，晋陶潜《搜神后记》卷九《鹿女脯》云：“淮南陈氏，于田中种豆，忽见二女子，姿色甚美，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湿。其壁先挂一铜镜，镜中见二鹿，遂以刀斫获之，以为脯。”⁵在这一故事中姿色甚美的二女子经墙上悬挂的铜镜一照，现出鹿身原形。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篇》：“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⁶

唐人对古镜所具有的神异功能的渲染在唐传奇《古镜记》和《敬元颖》中表达得更为充分。《古镜记》云：“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王度得到这面古镜后，发生了照出婢女鹦鹉是千年老狸、杀灭各种精怪、治愈龙驹家人的疾病等一系列神异故事，其中一则故事是一位神异的胡僧能够识宝，告诉王度这面古镜的种种神奇，如透日光、照脏腑、深藏泥中而不晦等⁷。《敬元颖》讲的是，天宝中，金陵书生陈仲躬居住在洛阳清化里一宅中，宅井常发生溺水事件，仲躬窥之，井中现一妖冶女子，原来是妖女诱人溺水。后此女求见仲躬，自称敬元颖，本是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面，贞观中为许敬宗婢女坠入井中，受井中毒龙驱使，化作人形，诱人溺水。但她不愿害人，希望仲躬帮她摆脱毒龙。仲躬遂命人淘井，但得古铜镜一枚，即敬元

〈1〉 《晋书》第三册，页811，中华书局，1974。

〈2〉 《独异志》卷上：“宋武帝未杀殷仲文之时，仲文每照镜，常不见其首，后数日，果为武帝所杀。”（《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页918。）

〈3〉 前揭《太平广记》卷四四〇《畜兽七》“逆旅道士”条，第九册，页3589。

〈4〉 前揭《太平广记》卷三七一《精怪四》“马举”条，第八册，页2949—2950。

〈5〉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页4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页300，中华书局，1996年。

〈7〉 前揭《太平广记》卷二三〇《器玩二》“王度”条，第五册，页1761—1767。

颖。敬元颖预知其井将崩，替仲躬另觅居所报答。后来，仲躬因此古镜而仕途通达^①。

《古镜记》和《敬元颖》生动地传达了唐人深信不疑的古镜神异观念，除了基于古镜照心照胆能治病，能现形，能预示吉凶的认识编撰的神奇故事外，这二则传奇还间接地阐述了圣人造镜乃古镜神异性产生的重要原因。《古镜记》云：“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敬元颖》中的古镜阔七寸七分，为师旷所铸，“其铸时，皆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则七月七日午时铸者也”。其中，师旷为乐圣，而黄帝则是铸镜的始祖。北宋高承在《事物纪原》一书中述及铜镜的起源说：“《玄中记》曰：尹寿作镜，尧臣也。《黄帝内传》曰：帝既与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则镜盖肇于轩辕，非尹氏始作也。”^②无论尹寿、师旷，还是黄帝，皆为唐人心目中的圣人，他们在铸镜时，参合日月，因而古镜则成为比一般铜镜更有神力的灵物。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汉以来既已形成铜镜神异的思想，唐人在接续前人思想的同时，有意识地将古镜的神异性夸大，并利用魏晋以来志怪文学的传统，通过自身丰富的文学创作加以宣扬，使古镜神异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样，本已在唐代极为少见的古镜就显得愈加珍贵。

（二）“古镜”的珍贵性

古镜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数量极少，在唐代社会中自然罕见难得。泰欣《古镜歌三首·一》：“尽道古镜不曾见，借你时人看一遍。目前不睹一纤豪，湛湛冷光凝一片。凝一片，无背面，嫫母临妆不称情，潘生回首频嘉叹。”^③唐人罕见古镜，一句“尽道古镜不曾见”道出了古镜的珍贵。

古镜所具有的神秘性，尤其是“持此则百邪远人”的神异功能，促使唐人想方设法地去发现并占有古镜。

隋唐时期人们得到古镜主要是通过家传和发掘古墓二个渠道。唐柳宗元《龙城录》中记载了一个爱好收藏铜镜的任中宣：“长安任中宣家素畜宝镜，谓之飞精，识者谓是三代物。后有八字，仅可晓，然近籀篆，云：‘水银阴精，百炼成镜。’”^④而盗发古墓应是隋唐时期发现古镜的主要原因，沈佺期《古镜》：“凿井遭古坟，古坟衬沦没。谁家青铜镜，送此长波月。……埋落今如此，照心未当歇。愿垂拂拭恩，为君鉴云发。”^⑤五代杜光庭撰《录异记》卷八《墓》记载：“李道，咸通末为凤翔府府曹，因推发掘冢贼，问其所发，云：‘……又一墓在咸阳原上，既入，得镜两面，可照人。鼻在侧畔。背面莹洁如新，磨毕

① 前揭《太平广记》卷二三一《器玩三》“陈仲躬”条，第五册，页1772—1774。

②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镜》，页420，中华书局，1989年。

③ 《全唐诗续拾》卷四四《南唐下》，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第十五册，页11587，中华书局，1999年。

④ （唐）柳宗元：《龙城录·任中宣梦水神持镜》，前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页143。

⑤ 前揭《全唐诗续拾》卷九，《全唐诗》（增订本），第十四册，页11023。

〔图十二〕葵花形月宫纹镜 上海博物馆藏



以面照之如常无异；以背照之，形状备足，衣冠俨然而倒立也。”^{〔1〕}《稽神录》：“周显德乙卯岁(955)，伪连水军使秦进崇修城，发一古冢。棺槨皆腐，得古钱破铜镜数枚。”^{〔2〕}

但是，无论家藏，还是掘墓获得的古镜数量毕竟很少，从考古发现来看，尽管有盗掘的因素，但各地发掘的上万座唐墓中仅发现十余件古镜的事实也可说明唐代古镜的稀有。

除此之外，古镜精良的工艺也曾引起唐人的惊叹。上海博物馆藏镜中有一面开元十年(722)造月宫纹葵花镜〔图十二〕，此镜为葵花形，兽钮，兽口噬咬一奔马，兽钮左面有一棵桂树，右面有玉兔捣药，下面有跳跃的蟾蜍。图案外围有三圈铭文，云：“杨府吕氏者，其先出于吕公望，封于齐八百年，与周衰兴，后为权臣田儿所篡，子孙流迸，家子(于)淮扬焉，君气高志精，代罕知者，心如明镜，曰：得其精焉。常云：秦王之镜，照胆照心，此盖有神，非良公所得。吾每见古镜极佳者，吾今所制，但恨不得，停之多年，若停之一二百年，亦可毛发无隐矣。蕲州刺史杜元志，好奇赏鉴之士，吾今为之造此镜，亦吾子之一生极思。开元十年五月五日铸成，东平郡吕神贤之词。”^{〔3〕}铭文共156字，文中盛赞古镜工艺精良，发出唐代铸镜难以企及的感慨。

由于古镜罕见难得，工艺精良，加之具有神异的功能，因而在铜镜的买卖中价格相对较高。薛逢《灵台家兄古镜歌》：“一尺圆潭深黑色，篆文如丝人不识。耕夫云住赫连城，赫连城下亲耕得。……十千卖与灵台兄，百丈灵湫坐中至。”^{〔4〕}薛逢为会昌初进士，诗中主要赞叹了古镜的神异和珍贵，顺带提及古镜的价格。从作者的语气透露十千钱应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笔记小说《广异记》中记载有天宝年间在

〔1〕 前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页1551—1552。

〔2〕 前揭《太平广记》卷三九〇《冢墓二》“秦进崇”条，第八册，页3122。

〔3〕 上海博物馆编：《练形神冶 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页262录文、页263图。

〔4〕 《全唐诗》卷五四八，《全唐诗》(增订本)，第八册，页6375，中华书局，1999年。

扬州三千钱买漆背金花镜之事^{〔1〕}，漆背金花镜应为唐代特种工艺镜，除去百年间物价变动的因素，可以推测古镜的价格是远远高于质量优良的唐镜的。

（三）“古镜”的社会性

古镜尽管年代久远，但经过磨砺后，仍能照面。许棠《新年呈友》“一月月相似，一年年不同。清晨窥古镜，旅貌近衰翁”^{〔2〕}，即说明古镜仍如一般唐镜一样发挥着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价值。但是，由于古镜的神异、珍贵，除了发挥照面梳妆的一般功能外，在唐代的社会生活中也具有特殊的用途，如佛道法事、社会交往和民间占卜等。

其一，佛道法事。

隋智顗说《方等三昧行法》之《方等秘法具六缘第一》中记载五行法缘需用“古镜一面以镇道场”^{〔3〕}。唐僧一行在求雨法事中也曾使用古镜，《酉阳杂俎》前集卷三云：“僧一行穷数有异术，开元中常旱，玄宗令祈雨……数日后，指一古镜，鼻盘龙，喜曰：‘此有龙矣。’乃持入道场，一夕而雨。”^{〔4〕}

贯休《古镜词》：“我有一面镜，新磨似秋月。上唯金膏香，下状骊龙窟。等闲不欲开，丑者多不悦。或问几千年，轩辕手中物。”^{〔5〕}僧贯休得到一面古镜，写诗记录，即使此诗是文学创作，并非实有其事，但从贯休的诗中也可可见佛僧对古镜的珍视。

考古发现杭州雷锋塔五代地宫中瘞埋有10面铜镜，其中有西汉日光镜一面，隋、初唐的瑞兽铭带镜，盛唐的海兽葡萄镜、双鸾葵花镜^{〔6〕}，在五代地宫瘞埋时，这些五代时已非常少见的“古镜”，很可能是作为礼佛宝物被埋入地宫的。

道教法事活动用古镜的情况，在记载宋元明时代道教符箓咒术较多的《道法会元》中有关于用古镜化真人的方法，《上清五元玉册九灵飞步章奏秘法》章仪中的拜章集神法，“以正月一日或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起首，清静斋戒，入室东向平坐，以古镜一面明莹者，左手持镜，右手握固，凝神定息，严具衣冠，存思己形，明照熟认，再择庚申、甲子日子时入靖室，依前端坐，即不用镜”^{〔7〕}，通过默念神咒即可道气满充，化为真人。

另外，道教符咒中也提到古镜的神力超过一般镜子，如“点灯立镜咒”曰：“明灯照出千年鬼，古镜

〔1〕 前揭《太平广记》卷三三四《鬼十九》“韦栗”条，第七册，页2651。

〔2〕 前揭《全唐诗》卷六〇三，《全唐诗》（增订本），第九册，页7027。

〔3〕 《大正藏》，第46册，页945，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印行，1983年。

〔4〕 前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页588—589。

〔5〕 前揭《全唐诗》卷八二七，《全唐诗》（增订本），第十二册，页9397。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锋塔五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5期，页23—24。

〔7〕 《道法会元》卷一八五，《道藏》第三十册，页177，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照出万年精，太阳正照，阴鬼当衰，神光耀目，光露太微，我今所照，众恶皆摧，七气成斗，三气成台，五星洞照，万劫咸灰。符到速捉，符到速追，急急如北帝律令敕。”¹¹“南斗现镜符”召鬼神现形，作法是：“朱书圆镜中，午文南气呵入镜中，镜前后左右用筋五只圈定，筋上各有符系之，存为直月五将军，念云：五方五帝真君敕。念毕，取五方气吹坛中，用筋攢地，直安镜于上……午文南气呵入镜中……卯文东气吹布灯坛镜筋之中，次念咒曰：圆镜照出千年祟，古镜照出万年邪。咒毕，午文南气呵剔入镜。”¹²

虽然，《道法会元》为晚于唐代的道书，但从圆镜和古镜的区分上，亦可见唐代强化古镜神异思想的影响。对于唐代社会盛行的古镜灵异观念，作为唐代国教的道教同样也很重视。唐代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开元九年(721)和开元十五年(727)二度应诏入宫¹³。在他居京期间，曾向玄宗进献宝镜，并得到玄宗的御批及诗。《道藏·洞玄部·灵图类·国字号》中有《上清含象剑鉴图》，图前有“天台白云司马承祯进”献含象镜表文¹⁴，说明此图是司马承祯向皇帝进献宝镜的图样。其表文中“此鉴所以外圆内方，取象天地也”、“词铭四句，理应三才”等词句表达了镜纹所包含的道教义理。表文后，附有镜的三幅图案与铭文：其一有日月星山，铭曰：“天地含象，日月贞明，写规万物，洞鉴百灵”；其二有龟，铭曰：“龟自卜，镜自照，吉可募，光不曜”；其三有龟及四神，铭则除了有第二镜之铭文外，还有一圈：“青盖作镜大吉昌，巧工刊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于旁，子孙富贵居中央”。其铭文从内容至形式都受到了古镜的影响(见第三部分的论述)。

其二，社会交往。

唐代诗歌中有一些朋友互赠古镜的记载，如刘长卿《见故人李均所借古镜恨其未获归府斯人已亡怆然有作》：“故人留镜无归处，今日怀君试暂窥。岁久岂堪尘自入，夜长应待月相随。空怜琼树曾临匣，犹见菱花独映池。所恨平生还不早，如今始挂陇头枝。”¹⁵皇甫冉《寻戴处士》：“车马长安道，谁知大隐心。蛮僧留古镜，蜀客寄新琴。”¹⁶朱昼《赠友人古镜》：“我有古时镜，初自坏陵得。蛟龙犹泥蟠，魑魅幸月蚀。摩久见菱蕊，青于蓝水色。赠君将照色，无使心受惑。”¹⁷李益《校书郎杨凝往年以古镜贶别今追赠以诗》：“明镜出匣时，明如云间月。一别青春鉴，回光照华发。”¹⁸这些诗歌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人

〈1〉 前揭《道法会元》卷一六七《上清天蓬伏魔大法补遗》，《道藏》第三十册，页75。

〈2〉 前揭《道法会元》卷一六六《上清天蓬伏魔大法》，《道藏》第三十册，页61。

〈3〉 《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司马承祯》，第十六册，页5128，中华书局，1975年。

〈4〉 前揭《道藏》第六册，页683—686。《全唐文》卷三七元宗皇帝《答司马承祯进铸含象镜剑图批》未载诗(第一册，页407，中华书局，1983年)。《全唐诗》卷三有李隆基《答司马承祯上剑镜》一诗(第一册，页32)，与《道藏》载诗相同。

〈5〉 前揭《全唐诗》卷一五一，《全唐诗》(增订本)第三册，页1566。

〈6〉 前揭《全唐诗》卷二五〇，《全唐诗》(增订本)第四册，页2825。

〈7〉 前揭《全唐诗》卷四九一，《全唐诗》(增订本)第八册，页5602。

〈8〉 前揭《全唐诗》卷二八二，《全唐诗》(增订本)第五册，页3200。

们将古镜视为难得的馈赠佳礼的事实。前述《古镜记》中王度的古镜，也是通过受赠的方式从天下奇士侯生那里得到的。古镜作礼品优于一般铜镜，自然是因为它的稀有，具有较一般铜镜更高的价值。

其三，民间占卜。

由于铜镜显现的物象预示吉凶，可作为占卜用具。在唐代有意识地用镜占卜，在民间祠灶的“镜听”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王建《镜听词》：“重重摩挲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回身不遣别人知，人意丁宁镜神圣。怀中收拾双锦带，恐畏街头见惊怪。嗟嗟嚟嚟下堂阶，独自灶前来跪拜。出门愿不闻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过尽，好语多同皆道来。卷帷上床喜不定，与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见，重绣锦囊磨镜面。”^①李廓《镜听词》：“匣中取镜辞灶王，罗衣掩尽明月光。昔时长著照容色，今夜潜将听消息。门前地黑人来稀，无人错道朝夕归。更深弱体冷如铁，绣带菱花怀里热。铜片铜片如有灵，愿照得见行人千里形。”^②这两首诗对于镜听用镜都没有特殊的要求，但在元代伊世珍《瑯嬛记》卷上引《贾子说林》讲到镜听时说：“镜听咒曰：并光类俚，终逢协吉。先觅一古镜，锦囊盛之，独向灶神，勿令人见，双手捧镜，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吉凶。又闭目信足走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此法惟宜于妇女。”^③选择古镜来镜听，颇符合唐人古镜较之一般铜镜更加灵异的思想，很可能古镜也用于类似的民间占卜活动中。

古镜的神异性、珍贵性和社会性对唐代的铜镜铸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或许是受人们对古镜崇尚心理的驱动，或许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亦或许是因为受到精良古镜的触动，有唐一代，在铜镜的装饰图文上留下了古镜的影子，并且，这种影响持续了较长的时间。

三 “古镜”对唐镜装饰图纹的影响

对唐代铜镜的镜形、纹饰及铭文的变化，孔祥星、徐殿魁、颜娟英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徐殿魁根据纪年唐墓出土铜镜的资料将唐镜的发展演变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初唐期，七世纪初至七世纪晚期，即唐高祖至唐高宗在位时期；第二期，盛唐期，七世纪晚至八世纪中期，即武则天光宅元年(684)至玄宗开元年末(741)；第三期，中唐期，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初，即玄宗天宝年(742)始至德宗贞元末年(805)；第四期，晚唐期，九世纪初至十世纪初，即宪宗元和元年(806)至唐末哀帝天祐四年(907)^④。孔祥星将隋至初唐作为隋唐铜镜分期的第一期，并指出隋至初唐延续前朝铜镜纹饰因素较多，“如流行圆形镜形，布局拘束谨严，分区配置花纹，‘规矩配置’和钮外大方格，柿蒂纹或连珠纹钮座，主题纹饰

① 前揭《全唐诗》卷二九八，《全唐诗》(增订本)第五册，页3379—3380。

② 前揭《全唐诗》卷四七九，《全唐诗》(增订本)第七册，页5494。

③ 《笔记小说大观》第九编第五册，页3442，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5年。

④ 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页333。

以灵异瑞兽为主，铭文带及善颂善祷的铭文内容等，都是从汉代以来铜镜中经常出现的传统因素，尽管形式已发生了若干变化”¹。应该说，此期是唐以前的古镜对唐镜影响最深的一个时期。

在铸镜史上，一时代之初期延续前一时代的工艺样式和风格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较为特殊的是，隋至初唐的铜镜没有延续距隋唐最近的两晋以后的铜镜风格，而是承继了汉代铜镜的传统，尤其是“隋初铜镜已摆脱了汉末以来所流行的，纵横排列、构图繁密的神兽镜题材与形式，恢复东汉盛行的环绕中心圆钮来安排四兽或十二生肖镜式”。对于这一现象，颜娟英解释为：“隋朝统一天下后，铜镜再度发展之前，反省、摸索旧有的传统，逐渐在风格上与汉朝（铜镜发展之盛世）衔接起来，从复古出发以求变，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²

颜娟英指出这种“顺理成章”与汉以来铜镜的发展密切相关。汉朝至三国两晋时期，铜镜发展蓬勃，墓葬出土数量极为丰富。到了两晋后隋以前，则极少出现铜镜，一般称为铜镜之衰微期³。但从隋唐墓葬出土古镜的情况看，隋唐对传统的学习，可资借鉴的材料绝大多数为汉镜应是主要原因。因为有意识地选择应基于了解研究的基础之上，从以下的论述中（见第四部分），我们可以知道唐人对古镜的年代及图案、铭文的认识皆十分模糊。另外，虽然我们难以判断唐代古镜神异超越一般铜镜这一思想的起始时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思想动因导致了唐代铜镜铸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了唐代存世较多的汉镜的影响。

隋至初唐铜镜受到汉镜较大的影响，以往学者研究较多。盛唐以后，尽管“从复古出发以求变”的特点较之隋至初唐时期有了很大变化，但仍有少数复古风格的铜镜，从以往考古发现来看，有以下三种纹饰的铜镜，仍延续了古镜的风格：

第一种，圆形蟠螭纹镜。洛阳北瑶墓3出土一面，直径17.1厘米⁴；陕西省拣选一面，直径17厘米〔图十三〕⁵。圆钮，双圈弦纹钮座。钮座内圈饰绳纹，外圈饰云纹。镜面主体纹饰以六组互相缠绕的蟠螭纹组成，每组均以螭首两两相对，其中三组螭首面向钮座，另外三组螭首面向镜缘。螭体均饰有纤细的连续的云雷纹，蟠螭之间空隙处留白，镜面钮座双圈、镜缘各有一道凸起的窄棱。此种铜镜可能是唐人仿照战国秦汉时期的蟠螭纹而设计铸造的。

第二种，葵花形四夔龙镜。西安东郊韩森寨东南第59号唐墓出土一面，直径9.6厘米⁶；西安东郊

〈1〉 孔祥星：《隋唐铜镜的类型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页394，文物出版社，1980年。又参见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

〈2〉 颜娟英：《唐代铜镜文饰之内容与风格》，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本，1990年。

〈3〉 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页561—5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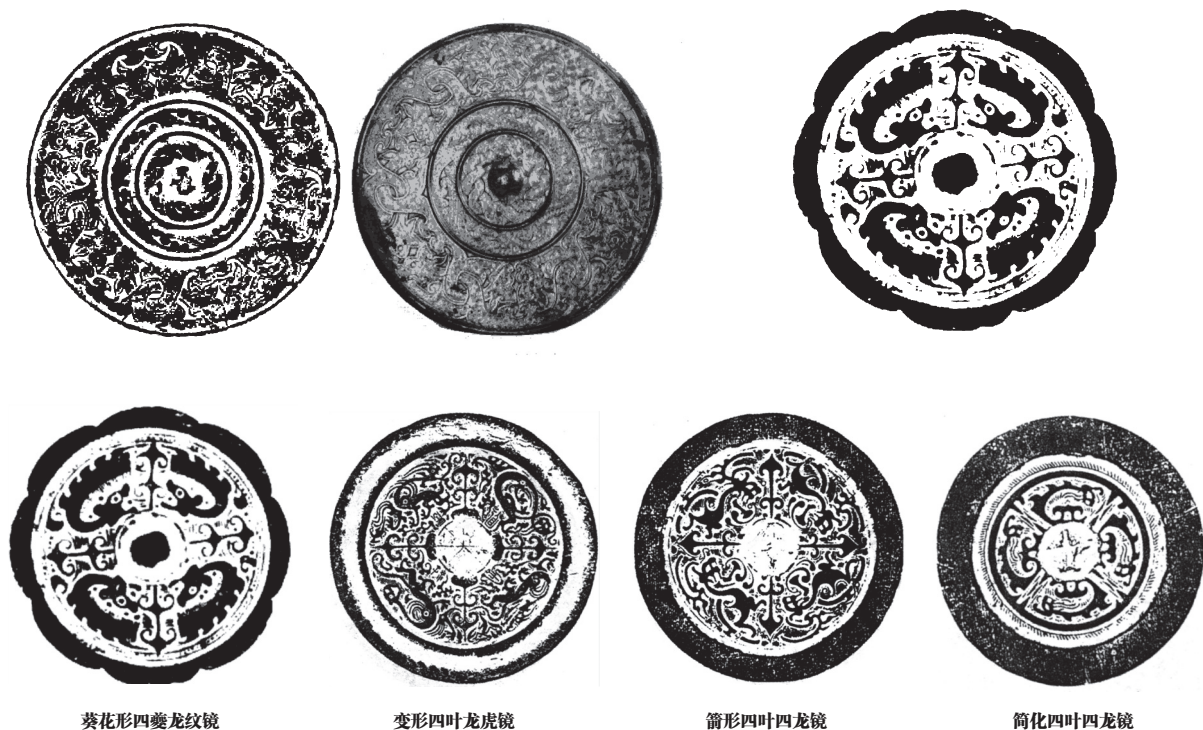
〈4〉 前揭《洛阳出土铜镜》，图93，图片说明见页13。

〈5〉 关双喜：《陕西省博物馆收藏一面唐代蟠螭纹铜镜》，《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页41。

〈6〉 前揭《陕西省出土铜镜》，页174，图164。

〔图十三〕圆形蟠螭纹镜 陕西省博物馆拣选

〔图十四〕葵花形四夔龙纹镜 西安东郊黄河机械厂中晚唐墓出土



〔图十五〕葵形四夔龙纹镜与汉镜的比较

黄河机械厂中晚唐墓出土一面，直径9.8厘米〔图十四〕^{〔1〕}；偃师杏园中唐墓M2503出土一面，直径10.2厘米^{〔2〕}。这三面镜基本相同，皆圆钮，圆钮座，座外生出十字形变形四叶，将镜背分为相等的四瓣，每瓣内各有一含珠曲背的夔龙，两组头部相对，其间饰以变形云纹。近缘部双环线内饰连珠纹一圈，宽素缘。此种铜镜的图案布局和风格与《中国铜镜史》所述汉代变形四叶龙虎镜、箭形四叶四龙镜极为相似，夔龙的尾部与简化四叶四龙镜的龙的尾部形式相类〔图十五〕^{〔3〕}。

第三种，葵花形博局纹镜。宁夏固原市南塬唐墓出土一面〔图十六〕，直径10.9厘米，八瓣葵花形，圆钮，四叶纹钮座，座外双线方栏，栏内钮侧有两小乳钉，栏外为八乳博局纹间列鸟纹。外围两组双弦间以横齿纹，宽缘上饰一周锯齿纹和一周双线波折纹，间以一道弦纹相隔^{〔4〕}。此镜镜纹与汉代禽鸟博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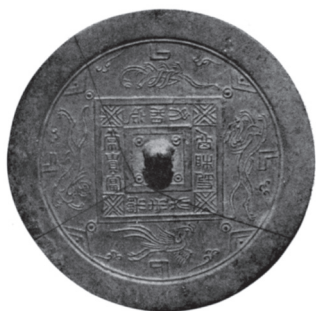
〔1〕 徐进：《西安东郊黄河机械厂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页26，图三：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页141文、页143图134—1，科学出版社，2001年。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一文载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偃师杏园郑夫人墓出土一面葵花形四夔龙镜，《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页325—326。《偃师杏园唐墓》报告中该墓没有铜镜出土，这面葵花形四夔龙镜为M2503出土，本文采纳考古报告的资料。

〔3〕 管维良：《中国铜镜史》，页114—115，图190、191、193，重庆出版社，2006年。

〔4〕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宁夏固原市南塬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页37，图一三。

〔图十六〕博局镜
宁夏固原市南塬唐墓出土



〔图十七〕仿汉式简化四神博局镜
西安东郊韩森寨东南第10号唐墓出土



〔图十八〕仿汉式龙虎镜
西安东郊王家坟第163号唐墓出土

纹镜基本相同，但葵花形却是盛唐、中唐时期较多出现的镜形，此镜应是盛唐时仿汉代铜镜装饰因素而制成的复古风格的唐镜。

有唐一代，除了以上借鉴汉镜因素“从复古出发以求变”的带有汉镜风格的隋唐镜外，还有少量的模仿古镜的仿制镜，从已发现的仿制镜来看，主要是仿汉镜。经考古发掘报告的唐墓中出土过几面仿汉镜：

1955年西安东郊韩森寨东南第10号唐墓出土一面四神简化博局镜〔图十七〕^{〔1〕}，直径13.8厘米，圆钮，方格四乳钮座，钮座外方格内有铭文带，铭文左旋，每边三字：“常富贵，乐未央，长相思，毋相忘”，铭文为篆体，方格铭文带外四角各有一乳钉和V字纹，间隔有L纹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素平缘。此镜TVL纹不完全，一般称为简化博局镜。虽然该镜的镜形、纹饰皆类汉镜，但四神没有繁密的云纹背景填充，留白较多，四神的形体刻画和风格也与汉镜有别，当为唐仿汉镜。

1956年西安东郊王家坟第163号唐墓出土一面灵鼈镜〔图十八〕^{〔2〕}，直径11.7厘米。圆钮，圆钮座，主区纹饰为同向环绕的二龙，其外有一周栉齿纹，边缘上饰锯齿纹、双线波折纹、锯齿纹各一周。此镜颇类汉三国时期的龙虎镜，但汉至三国时期龙虎镜的龙虎头部皆为侧面，而这面龙虎镜龙头为正面。另外，圆钮外由一个扁圆与三个“>”、三个“<”组成的钮座装饰在汉至三国时期也很少见，此镜应为唐仿汉镜。

1955—1961年发掘的西安郊区隋唐墓中发现有二面仿汉镜：

墓415出土一面直径14.6厘米的仿汉式鸟兽七乳镜〔图十九〕，圆钮，动物形座。报告作者认为此镜是仿汉镜造的，原因是花纹的线条较粗，镜缘不如汉镜平直，钮和座的形状和纹饰也不相同^{〔3〕}。

墓561出土一面直径16.9厘米的仿汉式博局镜〔图二十〕^{〔4〕}，此镜花纹有些模糊，但可以看出该镜与1999年河南地质医院中唐墓出土的直径17.1厘米的仿汉式云纹博局镜〔图二十一〕花纹基本相同，皆为半

〔1〕 前揭《陕西省出土铜镜》，页175，图165。

〔2〕 前揭《陕西省出土铜镜》，页107，图97。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页75文，图见图版肆柒2，科学出版社，1966年。

〔4〕 前揭《西安郊区隋唐墓》，页74文，图见图版肆柒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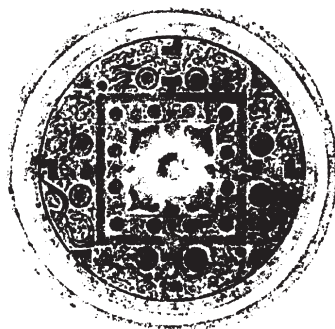
〔图十九〕仿汉式七乳鸟兽镜
西安郊区隋唐墓M415出土



〔图二十〕仿汉式博局镜
西安郊区隋唐墓M561出土



〔图二十一〕仿汉式博局镜
河南地质医院唐墓出土



圆钮，柿蒂状钮座，钮座外为单线方格与双线方格，其间饰乳丁，乳丁间似有铭文，方栏外饰八个乳丁及规矩纹间变形卷云纹，再外有两周凸弦纹，窄素缘^{〔1〕}。这二面博局镜的纹饰题材颇类汉镜，但从花纹风格上看，与汉镜迥异，尤其是方格内区域面积较大的布局方式不同于汉镜，显系仿汉的制品。

从文献资料亦可见盛唐以后古镜对唐镜的影响。张说《咏镜》：“宝镜如明月，出自秦宫样。隐起双蟠龙，衔珠俨相向。”^{〔2〕}此诗吟咏的宝镜纹饰特点与上述葵花形四夔龙镜颇为相像，“出自秦宫样”一句应是说宝镜是按照“照心照胆”的秦咸阳宫镜的样式铸造的，那么，葵花形四夔龙镜与张说《咏镜》诗的印证说明玄宗时代仍延续古镜样式在铸造新镜。玄宗时代，司马承祯在铸造道教镜时，也参考了古镜。他的《上清含象剑鉴图》之第一种镜图〔图二十二〕，四山字钮，钮外方格内以四字铭文和四山字纹间隔分布，其外八卦卦象又组成一个大方格。大方格的布局与汉代博局、隋至初唐四神镜之方格一脉相承，“山”字形纹见于战国“山”字纹镜，加以重新组合，“天地含象，日月贞明，写规万物，洞鉴百灵”16字铭文，四个一组组成汉镜方枚的形式。此镜图的唐镜实物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面^{〔3〕}和磁涧老井村征集的一面〔图二十三〕^{〔4〕}铭文间无界格；巩县石家庄5号墓出土的一面〔图二十四〕^{〔5〕}铭文间有界格，更近于汉代方枚形铭文布局，四个四山字纹变作松树与山岳纹。《上清含象剑鉴图》之第三种有铭文带：“青盖作镜大吉昌，巧工刊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于旁，子孙富贵居中央”，此铭文为东汉镜中常见的文辞，青盖亦是东汉时期私人制镜的姓氏名。类似的镜铭在唐墓出土的铜镜中也有发现，黄石市新下陆一号唐墓出土一面边长12.6厘米的亚字形镜，镜背饰有凸起的龙、虎等纹饰，其外有隶书铭文一

〔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区两座唐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地质医院唐墓的年代，发掘者推断当在公元760—800年间。

〔2〕 前揭《全唐诗》卷八六，《全唐诗》（增订本），第二册，页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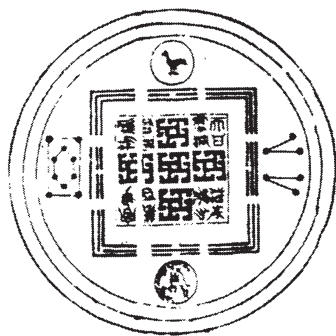
〔3〕 郭玉海：《故宫藏镜》页121，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4〕 前揭《洛阳出土铜镜》图83，图片说明见页12。

〔5〕 前揭《洛阳出土铜镜》图81。

〔图二十二〕《上清含象剑鉴图》收录的第一种镜图

天而地
地而天
周舍象
易物象
物洞日
洞璧月
璧百貞
百靈明。



〔图二十三〕上清含象镜之一
磁涧老井村征集



〔图二十四〕上清含象镜之二
巩县石家庄5号墓出土



圈：“青器作竟大母伤，巧工图之成文章。左龙右雨辟不羊，困□隍阳子孙用其□中央兮”。^{〔1〕}该墓年代的上限不早于肃宗乾元六年(758)，为中唐以后的墓葬。据徐殿魁唐代纪年唐墓出土铜镜的研究，亚字形镜出现于盛唐，流行于晚唐，黄石市新下陆出土的这面铜镜为唐镜受汉镜影响的较晚的实例。

盛唐以后存在的借鉴汉镜铸造的创新镜和仿汉镜是铜镜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一般说来，“任何一个朝代的早期阶段，都存在着既反映前朝文化特点又反映当代文化特点的器物。随着时代的演进，前朝的文化残余逐渐消失，其中部分融和于当代文化之中，文化的差异缩小乃至趋同，器物上只见当代文化的特征了”^{〔2〕}。以上五面仿汉镜出自的墓葬年代皆不明确。尽管我们不能确切地指出这种仿制所对应的具体时间，但从圆形蟠螭纹镜、葵花形四夔龙纹镜、葵花形博局纹镜以及亚字形铭文镜的出土可以看出，唐代对汉镜的借鉴一直持续到中唐乃至更晚的时期。由于唐人对汉镜的发现和社会上流行的古镜观念的促动，唐代从初期至晚期，一直在学习古镜，并且创造新的古风镜式。同时，仿汉镜的出现也不能排除人们受利益驱动的影响。

四 唐人对“古镜”特征的认识

（一）“古镜”的年代

从上述唐墓中出土的古镜可以看出，在唐代社会中，人们发现的绝大多数古镜是汉镜，唐墓中出土的借鉴古镜的创新镜和仿古镜基本上都是以汉镜为对象，也可以证明汉镜在唐代是最为常见的古镜。

但在唐代关于古镜的文字材料中，从未提及汉镜。唐人对于古镜的年代大致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将古镜的年代推至轩辕等圣人的时代。

〔1〕 黄石市博物馆：《黄石市新下陆一号唐墓》，《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页47。

〔2〕 张懋镛：《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考古学报》2005年第1期，页5。

周匡物《古镜歌》：“轩辕铸镜谁将去，曾被良工泻金取。明月中心桂不生，轻冰面上菱初吐。蛟龙久无雷雨声，鸾凤空踏莓苔舞。欲向高台对晓开，不知谁是孤光主。”^①贯休《古镜词》：“我有一面镜，新磨似秋月。……或问几千年，轩辕手中物。”贯休《古意代友人投所知》：“……客从远方来，遗我古铜镜。挂之玉堂上，如对轩辕圣。”^②《古镜记》中侯生赠给王度的古镜也是轩辕黄帝所造。

第二种，春秋时期。

此种说法仅见于唐传奇《敬元颖》中，所述古镜为春秋时期师旷所铸。

第三种，秦与晋。

这是唐代文献中出现最多的一种古镜年代说法，依托于唐代流行的秦宫镜、仁寿镜为神异灵物和祥瑞之物的观念，广为传布。

古镜为秦代镜，见于多首唐诗，如李白《相和歌辞·白头吟·二》：“妾有秦楼镜，照心胜照井。愿持照新人，双对可怜影。”^③徐夤《咏怀》：“借取秦宫台上镜，为时开照汉妖狐。”^④仲子陵《秦镜》：“万古秦时镜，从来抱至精。……但见人窥胆，全胜响应声。”^⑤张佐《秦镜》：“楼上秦时镜，千秋独有名。菱花寒不落，冰质夏长清。龙在形难掩，人来胆易呈。升台宜远照，开匣乍藏明。皎色新磨出，圆规旧铸成。愁容如可鉴，当欲拂尘缨。”^⑥李益《府试古镜》：“旧是秦时镜，今藏古匣中。龙盘初挂月，凤舞欲生风。石黛曾留殿，朱光适在宫。应祥知道泰，鉴物觉神通。肝胆诚难隐，妍媸信易穷。”^⑦以上唐诗所言的秦镜、古镜皆与《西京杂记》咸阳宫宝镜有关。与此相同的内容也常见于唐镜镜铭中^⑧，如“花发无冬夏，临台晓夜明。偏识秦楼意，能照美妆成。”“赏得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常云：秦王之镜，照胆照心，此盖有神……”等。

与秦宫镜相对应的神异之镜还有三国吴王仁寿殿之镜。晋陆机《与弟云书》曰：“仁寿殿前有大方铜镜，高五尺余，广三尺三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写人，形体了了，亦怪也。”^⑨《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仁寿之镜徒悬，茂陵之书空聚”^⑩一句也应是指仁寿殿之镜。关于秦宫镜、仁寿镜的神异功能的

① 前揭《全唐诗》卷四九〇，《全唐诗》（增订本），第八册，页5589。
② 前揭《全唐诗》卷八二七，《全唐诗》（增订本），第十二册，页9398。
③ 前揭《全唐诗》卷二〇，《全唐诗》（增订本），第一册，页247。
④ 前揭《全唐诗》卷七〇八，《全唐诗》（增订本），第十一册，页8224。
⑤ 前揭《全唐诗》卷二八一，《全唐诗》（增订本），第五册，页3191。
⑥ 前揭《全唐诗》卷二八一，《全唐诗》（增订本），第五册，页3191。
⑦ 前揭《全唐诗》卷二八三，《全唐诗》（增订本），第五册，页3226。
⑧ 以下引述唐镜镜铭，除特别标明外，皆引自颜娟英上揭文附录三，出处亦见该文附录三。
⑨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五《器物部》“镜”条，下册，页608，中华书局，2004年；《太平御览》卷七一七《服用部》一九“镜”条，第三册，页3179，中华书局，1995年。
⑩ 《周书》，第三册，页739，中华书局，1974年。

表述亦是唐镜铭文中常见的内容，如“阿房照胆，仁寿悬宫。菱藏影内，月挂壶中。看形必写，望里如空。山魑敢出，水质惭工。聊书玉篆，永镂青铜”；“美哉灵鉴，妙极神工。明疑积水，净若澄空。光涵晋殿，影照秦宫。防奸集祉，应物无穷。悬书玉篆，永镂青铜”；“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光含晋殿，影照秦宫。镌书玉篆，永镂青铜”^①。

以上三种唐人对古镜年代的说法皆基于古镜神异的观念，希冀圣人、帝王的佑护，而非针对古镜的形制、铭文、纹饰等特征，因而也是不准确的。

（二）“古镜”的铭文

唐人已注意到铭文乃古镜的显著特征，关注到古镜铭文的书体，但对铭文的文体特点认识模糊。

在唐代记录古镜的诗文中有述及铭文的，如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二》：“古镜铭文浅，神方谜语多。”^②薛逢《灵台家兄古镜歌》：“一尺圆潭深黑色，篆文如丝人不识。”柳宗元《龙城录》：“长安任中宣家素畜宝镜，谓之飞精，识者谓是三代物。后有八字，仅可晓，然近籀篆，云：‘水银阴精，百炼成镜。’”

唐代镜铭以楷书为主，古镜铭文以篆书为多，书体的明显差异自然引起唐人的注意。但是，仅靠书体来认识古镜，也会产生错误，前述《龙城录》中识镜者就是一例，宝镜铭文篆书，但“水银阴精，百炼成镜”的文辞为四字韵文形式，这是隋唐铜镜铭文的典型格式，类似内容的铭文亦常常出现于中晚唐以后的八卦镜上，如唐代八卦亚字形镜篆书铭文为：“水银阴精，辟邪卫灵，形神日照，保护长生。”〔图二十五〕^③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宋代窖藏出土的龟钮八卦十二生肖镜篆书铭文为：“水银是阴精，百炼得此镜，八卦气象备，卫神永保命。”^④湖南津市新洲一座明墓中出土的龟钮八卦十二生肖镜很可能是唐镜〔图二十六〕，其镜篆书铭文：“水银呈阴精，百炼得为镜，八卦寿象备，卫神永保命。”^⑤唐代铸镜者很可能利用了当时人们以书体鉴定古镜的办法，篆书铭文来仿制古镜。唐传奇《敬元颖》中的古镜亦是以此为根据的仿制镜，此古镜“镜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书。以今文推而写之曰：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年在世。于背上环书，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则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并如其位。于鼻四旁题云，夷则之镜。”在镜钮周围及镜背装饰较多的铭文起于西汉，文中叙述的春秋晋国镜镜背和钮座有铭文显然不符合铜镜铭文发展的历史，而头粗尾细形如蝌蚪的科斗篆铭文则与唐人对古镜镜铭书体的认识是一致的。

① （明）陈继儒：《妮古录》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四编第四册，页2367，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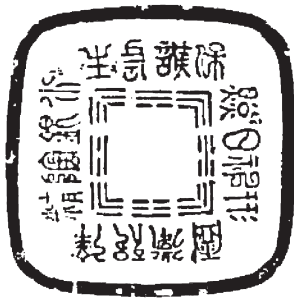
② 前揭《全唐诗》卷三八四，《全唐诗》（增订本），第六册，页4333。

③ 徐良玉：《扬州新出土的几面唐镜》，《文物》1986年第4期，页92，图七。

④ 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年第7期，页92，页94图一六。

⑤ 津市文物管理所：《湖南津市新洲镇发现一座明墓》，《考古》1994年第7期，页672，图二。

〔图二十五〕八卦铭文镜
扬州出土



〔图二十六〕八卦十二生肖镜
湖南津市新洲明墓出土



（三）“古镜”的纹饰

唐代涉及古镜纹饰特征的文献资料不多，笔记小说《古镜记》和《敬元颖》为最重要的二则。

《古镜记》中记述侯生赠给王度的古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

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此镜的图纹为伏兽钮，图案由四神、八卦、十二生肖、24个秘字分区组成，从文字记述来看，这面宝镜的图纹符合唐代道书《上清长生宝鉴图》^{〔1〕}第二品镜图〔图二十七〕的特征。《上清长生宝鉴图》从内容看应为六朝或隋唐上清派图书，一卷，收入《道藏·洞玄部·灵图类》。王育成认为《上清长生宝鉴图》是与开元年间道士司马承祯所绘《上清含象剑鉴图》同时流行的道士制造道鉴的镜式图案^{〔2〕}。其中第二品镜图没有文字说明，纹饰由五个内容组成：四灵之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八卦卦象，十二属相（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24个难以辨识通读的道教秘字，上、下两卦象图。王育成将之定名为上清长生宝鉴秘字镜。由于此镜主区八卦卦象和最外圈的两个卦象图纹有重复，王育成认为这很可能是抄手、刻工的讹误造成的，原本并没有外圈的二卦。与此镜图基本相同的唐镜实物也有出土，偃师杏园墓地晚唐M2901出土一面铭文八卦十二生肖镜〔图二十八〕^{〔3〕}，虽仅存小半个，但圆形的镜形、内区八卦图形、中区生肖纹样和外区的道教秘字清晰可辨，符合上清长生宝鉴秘字镜的特点。另外，西安东郊晚唐墓出土一面保存完整的同纹方镜〔图二十九〕^{〔4〕}。由此可见，《古镜记》所述的铜镜应有所本，只不过此种铜镜并非古镜，而是唐镜。

《敬元颖》中所述的古镜纹饰描述不及《古镜记》细致清晰，有环书铭文、天文列宿、左日右月、四神列位等特点。具有这些特点的铜镜在1973年浙江省上虞县文化站曾收集过一面，此镜发现时已裂为两半，边缘部分残缺一小块，出土的时间、地点及伴出器物的具体情况已经无法查出，因镜背装饰有天象纹并极具唐代风格，故被定为“唐代天象镜”。该镜直径24.7厘米，圆形，瓦钮，以钮为中心铸出三个同心圆。小圆内布日、月、金、木、水、火、土星，即七曜，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

〔1〕 前揭《道藏》第六册，页679。

〔2〕 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第六卷，页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前揭《偃师杏园唐墓》，页213，图204—4；页214、页218，图208。

〔4〕 陈安利、马志祥：《西安东郊发现一座唐墓》，《考古》1991年第3期，页286、页288，图三。

〔图二十七〕《上清长生宝鉴图》第二品镜图



〔图二十八〕上清长生宝鉴圆镜
偃师杏园唐墓M2901出土



〔图二十九〕上清长生宝鉴方镜
西安东郊唐墓出土



〔图三十〕上清长生百炼镜
上虞文化站征集

北斗七星及四仙人像。中圆圆周内铸出二十八宿的名称，从东方开始，其顺序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氐”应是“氏”，“觜”当为“嘴”。大圆内铸天干地支，从正北的子开始，由北而东的顺序：子癸丑寅甲卯乙辰巳丙午丁未申庚酉辛戌亥壬，缺“戊、己”。大圆外铸出八卦图，铭文一周，其文：“铭百炼神金，九寸圆形，禽兽翼卫，七曜通灵，鉴□天地，威□□□，□山仙□，奔轮上清。”〔图三十〕^{〔1〕}此镜镜纹和铭文与道书《上清长生宝鉴图》中第一种镜铭和镜图〔图三十一〕极为相似。其第一种镜式前有一段文字，为：“镜铭曰：百炼神金，九寸圆形。禽兽翼卫，七曜通灵。鉴包天地，威伏魔精。名山仙佩，奔轮上清。”与上述唐代天象镜的铭文相同。而其镜图纹图纹的内容、布局与天象镜亦差异不大，只是镜图瓦钮上有“戊己”，小圆内以“青龙”、“虎”、“朱雀”、“玄武”、“仙人”、“仙女”、“仙童”等文字代替动物、人物形象。由此可知，唐代天象镜应是道书所言的上清长生宝鉴百炼镜。

《敬元颖》出自《博异志》，作者谷神子，谷神子其人，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和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皆认为是元和间进士郑怀古，谷神子(郑还谷)曾注严遵《道德真经指归》十三卷^{〔2〕}。郑怀谷、郑还谷应是同一人，从他注解道经来看，他对道教典籍应是比较熟悉的。《古镜记》所述古镜的纹饰特点与唐代道教镜相同，很可能这则传奇亦是道教术士或通晓道经的士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二则道教色彩浓郁的文学作品借助于唐代社会流行的古镜神异观念，利用人们对古镜图文特点不甚清楚，又极度迷信的心理来夸大新铸的道教镜的神异性，假借古镜以扩大道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五 结论

综上所述，隋唐以前就存在着铜镜神异的观念，唐代开始着重强调古镜的灵异和神奇，视古镜为辟邪灵物。古镜受到唐代社会普遍的重

〔1〕 任世龙：《浙江上虞县发现唐代天象镜》，《考古》1976年第4期，页277。

〔2〕 前揭《道藏》，第十二册，页341—395。该书原有十三卷，今存卷七至卷十三，前六卷缺佚。

视，人们得而宝之，在宗教活动、社会交往中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由于古镜难得，人们迷信古镜心理的需求和得到古镜的渴望，也促使唐代制镜匠师仿制古镜和借鉴古镜创造带有古风的唐镜。但是，唐代文献中对古镜的年代、铭文和纹饰特点的认识皆十分模糊，基于这一事实可以推论，隋至初唐起唐代铜镜较多地受到汉镜的影响并非是主体自觉选择的结果，从隋唐墓出土的唐以前的古镜绝大多数都为汉镜的事实推测魏晋南北朝留下来可资唐人借鉴的铜镜资源较少，学习研究的古镜便主要针对汉

〔图三十一〕《上清长生宝鉴图》第一品镜图



镜。以制作精良的汉镜为观摩学习的对象，无疑促进了隋唐铜镜的快速发展，使得隋至初唐时期既扭转了魏晋以来铜镜发展的衰退之势，汉风浓郁铸造精良的隋至初唐镜标志着铜镜铸造业的复兴。盛唐以后，尽管唐代自身的铜镜装饰风格已基本奠立，但依托于秦宫镜、仁寿镜等古镜神异思想和人们对古镜的需求，在工艺制作和纹样设计等方面保持汉镜风格的镜式并未完全消失。可以说，隋至初唐起至晚唐对汉镜艺术的传统进行学习和发扬，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创新，这一过程从未中断。此外，有唐一代，对古镜的钻研并不局限于铸镜匠师，还包括道教术士。他们在铸造义理明确道教镜的同时，利用唐人普遍信奉古镜神异的心理，借助于文学形式，从舆论上将道教色彩鲜明的铜镜说成是古镜，以此扩大道教的影响和道教镜的法力。中晚唐以后，道教镜的数量大增，除了道教影响力加剧的因素之外，古镜神异的观念也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道镜很可能被当作古镜受到当时人的珍视。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项坤鹏）

On Ancient Mirrors Excavated from the Sui & Tang Periods' Tombs: with Exploration into the Retro-style Bronze Mirrors of the Sui & Tang Dynasties

Fan Shuying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ve revealed the existence of bronze mirrors from previous time buried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s tombs. The Tang documents write that these bronze mirrors casted prior were called "ancient mirrors" by the Tang people which were so precious, extraordinary and sacred that they had played a certain functional role in social events, and further influenced the designs of bronze mirrors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fact that almost all the bronze mirrors from the Sui and Tang's tombs are Han-designed proves that there were few materials available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eriod for the Tang people to learn from, thus resulting in the Han-styled reproductions and renovations among the majority of the retro-style bronze mirrors during the Sui and Tang's periods. This was later an uninterrupted process being continued from Sui and Early Tang till Late Tang dynasty. However, the Tang people had no idea of the dates, inscription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ancient mirrors", which made it possible that the Tang craftsmen and Taoist priests produced the faked old ones as a result.

KEYWORDS: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mb, Han dynasty's mirror, Tang dynasty's mirror, retro-style

*The articles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04 to 125.*

A Research of the Painted Figurine of the Hu Chasseurs of the Tang Dynasty

Ge Chengyong

ABSTRACT: Among the figurines of the Hu chasseurs of the Tang dynasty are there many who have strong physique and thick beard, they used to wait upon their masters as the 'professional chasseurs' with special competence at hunting and taming the raptorial beasts and birds, or they were called 'Gong Ren' who came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along with the tribute animals, or 'Fan Kou' who immigrated into China for a living. Different from the Han hunters, they attached themselves to bigwigs to serve as their waiters in hunting activities with their skills. Their appearance made the rise of hun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hunting; the Hu people; a chasseur

*The articles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26 to 143.*